全球政治評論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第四十三期（2013）No.43 頁 41-70

學術論文

中國國家能力研究與崩潰論失準探討

A Study Approach of State Capacity towards China Collapse Thesis

初國華 *Gwo-Hua Chu*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Meiho University

張昌吉 *Chun-Chig Chang*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bor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崩潰論，直到九〇年代的中後期，仍在國際間不絕於耳。但若對照當今的中國崛起，則這都屬理論預測或經驗判斷對事實的落差或預測失準，這是值得研究的。至於，如何解釋與調適崩潰論與現實中國的落差，並嘗試改善對中國預測的模型，則是本文之研究目的。共產國家國際結構骨牌分析以及政治保守、經濟改革的崩潰預測，其推論過程都忽略中共因素的反應與抵制，以及中共回應外界變遷與挑戰的能力。本文擬從國家能力觀點對上述議題作分析。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na collapse theory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discussions over the Middle Kingdom's collapse have been incessant.

However, compared with China's rise today, it is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e theory's failed predic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empirical eviden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lose the gulf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and improve on models that attempt to forecast China's future. Domino theories and pessimistic predictions about communist states fail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CP's ability to react and respond to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is article tackles the issue from the approach of state capacity theory.

關鍵字：中國崩潰論、中國預測、國家能力、黨國體制

Keywords：China Collapse Thesis, Predict China, State Capacity, Party State Regime

壹、前言

中國大陸的動向一直是全球矚目焦點。[1]這個全球最大共產國家的未來，長期被政界與學界討論著。[2]尤其，中國的未來也將對台灣帶來極大影響。[3]1990 年代，蘇聯瓦解與東歐共產政權的骨牌性土崩效應，中國作為唯一的共產大國，遂廣受世界輿論與學界預測是下一塊骨牌。不論從台灣早期的「反共必勝、暴政必亡」，到李登輝時期的中國瓦解「七塊論」或國際盛傳的「中國崩潰論」，[4]若對照當今的「中國崛起」[5]或國際社會的 G2 現象，[6]則理論預測對事實的落差或預測失準是本文擬探討的動機，也是社會科學對一個大時代氛圍（times mood）的學術反省。[7]是以如何解釋與調適「中國崩潰論」與現實中國之間的落差、詮釋這個「失準」，並嘗試改善對中國預測的模型則是研究目的。

社會科學理論或學說總是時代的反映並受時代的影響與修正。本文研究可反映四個時代性的問題意識：（一）對內，這是對台灣早期「反共意

---

[1] 江振昌編，《後鄧小平的中國大陸》(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年)，頁 16。

[2] 張執中，《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2008 年)，頁 1。

[3] 天兒慧，《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台北：月旦出版，1994 年)，頁 9。

[4] 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何頻，《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新新聞文化，1994 年)，頁 18。另外，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楊文昌表示，九十年代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無法維持將會崩潰，因此被稱為「中國崩潰論」。請見：〈中國威脅論真改變了？專家持不同看法〉，《大紀元》，2007 年 6 月 26 日。直到九〇年代中後期，中國是否覆亡的猜測和疑慮，在國際間仍不絕於耳。請見：宋國誠，〈中共主辦二〇〇八奧運對其綜合國力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8 期 (2001 年 8 月)，頁 2。

[5] 謝淑麗(Susan Shirk)著，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2008 年)，頁 x。中國崛起論述已在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是影響亞洲以及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與國家。請見：初國華、張昌吉，〈中國崛起之意涵及其區域政治效應〉，《全球政治評論》，第 30 期 (2010 年 4 月)，頁 1。崛起應指，對世界力量格局、國際秩序和國際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請見：閻學通，《中國崛起及其戰略》(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

[6] 美國與中國大陸已成為國際社會的霸權國家或體制規則的制訂者。

[7] 自馬克斯主義在十九世紀崛起後，共產國家頂盛時曾統治地球的三分之一人口。冷戰期間，兩極意識型態的分隔、圍堵與對立更影響世界上大多數人民。然而，蘇聯瓦解、冷戰結束是個世紀性大事件，共產國家未來的走向與何去何從？是本文討論的氛圍與系絡。

識」的再認知或再詮釋；（二）在國際間，這是對中國崩潰論的檢視與重估；（三）在論述的驗證上，本文擬解釋與預測中共「政左經右」的改革路線；（四）在未來向度上，則擬對中國的民主化作評估及釐測。本質上，這四項「中國研究」議題是以「中國崩潰論」為核心，[8]但仍都各有其自身的邏輯一致性。亦即，中國崩潰論若在時間層面的向前延伸，可觸及台灣早期的反共復國之意識型態、政治口號或政策，如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或「三不政策」等等；若向下或向未來延伸，約可窺略中國的政權存續或國內外所關心的中國民主化走向與發展。其次，就學術或政界的思維想定，中國崩潰的主因是「政左經右」路線矛盾導致政權因不勝體系或結構負荷，或因內外在壓力而趨解體或體制轉型甚至陷入動亂等等。回顧 1980 年代，西方學界以及台灣在批判中共「政左經右」路線時，往往已隱含中國將因政經結構內在矛盾而導致體系崩潰的結論及預測。

其次，就語意內涵而言，中國崩潰論批判（criticism）與中國崛起，應是同形主義（isomorphism）的兩個概念與範疇。國際社會因中國崩潰的預測失效、失準或無以為繼，且因中國經改成功與國力日趨強大，又興起「中國崛起論」或「中國威脅論」。另外，在觀察中國崛起過程或關注未來走向也可探討另一個自由世界相當重視的問題：中國大陸會不會走向民主或何時民主？或中國大陸的民主形式為何？這問題可接續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民主運動，或最近北非「茉莉花革命」會否在大陸開花結果？

西方或台灣學界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往往從中國大陸的部份事實或事件（event）作推論與延伸，或從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效益外溢至政治之邏輯來解釋與預測中國大陸的趨勢與走向，而得到政權垮台或社會動亂與瓦解的結論或斷言。另一方面，就美國主治下「民主和平論」的世界觀或意識型態，中國大陸崩潰是可欲（desirable）的價值與冷戰思考慣性下瓦解共產政權的國家目標。然而蘇聯式共產國際集團骨牌性垮台與「政治保

[8] 當前對中國研究，很大一部份是為提供或建構建設性的兩岸關係作參考。請見：劉文斌，〈中共研究方法之反思〉，《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5 期 (2000 年)，頁 19。

守、經濟改革」悖離的崩潰事實與預測，其推論過程都忽略「中共因素」的反應（reaction）、抵制、適應以及中共回應外界挑戰的能力。[9]因此，本文擬從能力（power）或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觀點作分析主軸。

政治學的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ism）革命，Skocpol 主張國家理論（state theory）的回朝（bring back in），[10]這是以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為架構。但國家自主性是西方民主國家在面臨多元政體（polyarchy）與「團體政治」時，必須使國家自主性的存在先於國家能力，方能啟動國家機器以達自身目標；但中國大陸由於黨國體制等特性不必面對多元團體的紛歧或壓力政治，且國家主體性受憲法保障。[11]因此國家能力這個指標應可單獨視為是中共抗衡外界壓力藉以圖存的憑藉。其次，就黨與國家的關係，在西方國家是國家與社會的拮抗關係；但在中國大陸，社會往往是國家的輸送帶而傳達中央指令至邊緣。[12]在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下，憲政制度性的強化了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性合一的合理性與綜效性（synergy）。

本文從國家能力角度觀察中共回應「中國崩潰論」壓力，這也是探討中國崛起以及隱藏在其背後的國家能力基礎。至於研究結構，本文以國家能力為主軸而圍繞在一組四項的問題意識為架構，[13]因此本文是從國家能力角度作「中國崩潰論批判」，並以「政左經右路線」與「中國大陸民主

---

[9] 就體制轉型而言，蘇聯或歐共垮台與中共的經改成功，曾有學者指出是「震盪療法」與「漸進式改革」間的分野，但本文集中討論「中國崩潰論」的預測失準。

[10] Theda Skocpol and Peter Evans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中國大陸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是工農階級對國家領導的先鋒隊。See James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Hilo: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2), p.123.。由於大陸的黨國體制特質，遂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國家的領導與憲法規定的自主性。另方面，文化大學教授王方指出，由於中國大陸的黨國特性，使社會缺乏牽制國家機關形成國家的高度自主。請見：王方，〈中國特色 不學西方民主〉，《聯合報》，2010 年 10 月 12 日，版 13。

[12]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6.

[13] 此即：(一)台灣早期反共意識的省思與再認識；(二)對中國崩潰論的理論檢視；(三)詮釋與預測中共「政左經右」路線；(四)對中國未來民主化評估。

化」為例證，並在結論中，約略探討「台灣反共意識」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貳、中國崩潰論、中國共產黨與國家能力界定

雖然台灣早期即有「暴政必亡」的政治口號或意識型態宣傳，但國際社會鵲起「中國崩潰論」的概念或討論，應是「八九民運」學生運動以後的事。

一、中國崩潰論探討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外電報導中共軍隊屠殺二千多人而傷者無數，這引起國際輿論撻伐與美、日、法、英等國的經濟制裁，使中共的國際形象敗壞至極。[14]蔡瑋教授針對 1989 年 4 月 21 日至 8 月 22 日的美國知名報紙進行統計，報導天安門事件的社論有 58 篇，專欄 204 篇；另據學者黃辟輝統計，從 1989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與美國的紐約時報，對該事件的報導計有 3883 則。[15]該事件後，接續著 1990 年代初的「蘇東波」效應，則中國大陸將跟隨共產集團瓦解的預測遂在學界風行，政界也瀰漫此種流行看法，這以美國總統雷根說「將共產主義掃進歷史灰燼」可為代表。自天安門事件或 1990 年代前後，台灣媒體如同大陸研究學者一般，總是循著「共產必亡」假設進行報導與研究。[16]基本上，天安門事件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可有六股不同力量：海外民運、大陸民間民主力量、中共內部民主派、香港、台灣以及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17]

---

[14] 陳慶，〈四十年來的中共外交〉，收錄於華力進、雷飛龍主編，《海峽兩岸四十年(上冊)》(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94 年)，頁 306-307。

[15] 石之瑜、廖高賢，《在美國與台灣的中國印象》(台北：台大政治系中國研究中心，2009 年)，頁 97。

[16] 同前註，頁 124。

[17] 明居正，〈台灣與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 (1999 年)，頁 2。

然而，國內外巨大的社經變動與壓力是否必然導致政權瓦解？[18]雪梨大學教授 Frederick Teiwes 指出，1989 年天安門事件讓許多觀察家出乎意料，專家們都預測中共會隨之瓦解，但它並沒有。[19]其實這已突顯自由世界學者對中國大陸問題預測失靈的檢討與反省。1990 年以前，政治學者在分析列寧體制國家（state of Leninist regime）轉型時，大致可分兩派：悲觀派認為列寧體制如中國大陸者，因過於僵化的政治經濟結構，若無法因應人民的改革需求，終將引起反叛與衝突，因此該等國家一旦改革不成便會走向崩潰；而樂觀派則強調，「第三波民主」形成的世界潮流是不可逆轉的，這將促使列寧體制國家走向民主。[20]事實上，不論悲觀派的條件式預測或樂觀派的斷言式展望，相較於中國大陸國情的觀察似乎都不盡貼切。

傳統上，對中共政治的研究途徑例如極權主義模式多屬靜態分析，[21]這易將研究客體視為固定或不變，也易忽略中共執政者的改革成效或社會的動態發展，且一黨體系或一黨統治理論之不足也都影響學界對共黨政權瓦解的預測力。另外，也有些學者將「衰退」與「瓦解」合併討論等等。[22]基本上，本文假定，中國崩潰論的預測失準或中國崛起的擅場，就表示中國大陸的國家能力大於國內外所加於中國大陸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的壓力總和，畢竟政治的本質是力量間的對比與抗衡。其實，這個假定是因「中國崩潰論」的內在邏輯而設的，亦即「崩潰論」以為中共必然無法承受體制矛盾、僵化、落後所引起的外環境壓力（主要是內部壓力）而走向解體。

天安門事件至今已廿餘年，而 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

---

[18] 張執中，前引書，頁 1。

[19] 田弘茂、朱雲漢主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從十五大走向廿一世紀》(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 年)，頁 88。

[20] 袁易，〈中共威權政體轉型之政治動力〉，收錄於江振昌編，《後鄧小平的中國大陸》(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年)，頁 32-33。

[21] 極權模式假定國家是全知與全能的。See: Shue, *op cit.*, p.76.

[22] 張執中，前引書，頁 9-10 & 15。

的政經結構與體制都產生可觀變化。趙建民指出，目前中國大陸應屬「後極權發展型威權政體」，其重要特徵有：（一）它仍有強大的黨國體制，這遠非威權國家的個人獨裁可比；（二）基於極權主義傳統，國家控制力依然強大。[23]當今，中共黨國體制應屬「後極權」威權政體，它雖已消蝕「極權政體」的典型特徵，如絕對的意識型態主導、黨國對經濟的全面控制、政治運動風行、促成社會革命等等，卻也保留許多極權的元素，如一黨體制、對政治組織、社會組織、新聞媒體、武裝力量的壟斷等等。[24]這些極權元素都有利於中共形成與建構強大的國家能力來抗拒外在環境的壓力而免於解體，且國家能力在解除危機後，將更有能力強化自身的自主性與合法性，進而使能力建立（capacity-building）產生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或良性循環而更加壯大。

二、中共的屬性與意義

本質上，「中國崩潰論」的主體是中心共產黨。政黨總要確保與實現某階級或團體的利益。[25]共產黨最明顯的特徵是階層式、金字塔式與高度的權力集中，[26]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社會人口結構的菁英組合，截至 2006 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七千三百三十六萬名（表一）。中共的列寧式政黨屬性是集權主義的政治制度，其特徵有：排他性的意識型態、一元化權力中心、單一政黨等等。[27]對列寧式黨國體制而言，組織結構強韌的黨以及

---

[23]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1994 年)，頁 80-83。關於國家控制力，最近則被用來解釋中國大陸能免疫於北非傳來「茉莉花革命」的主要原因。其實，不論是天安門事變的「內因型」事件，或茉莉花革命的「外因型」或「外來型」刺激，其測試或釐測「中國崩潰或革命」的內在邏輯都有前後一致性。

[24] 徐斯儉，〈軟紀律約束：改革中共黨國體制的內在限制〉，收錄於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2007 年)，頁 169。

[25] Save Klimovski 著，張明貴譯，《政治與體制》(台北：聯經，2000 年)，頁 483。

[26] 中共術語彙解編輯委員會，《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台北：中國出版公司，1977 年)，頁 184。

[27] 李少民編，《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1992 年)，頁 278。

掌握人民思維與教化的意識型態是政治運作核心。[28]總之，黨國概念受到「極權主義」模式影響，強調共黨在國家的核心角色，[29]且中國大陸憲法保障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因此中共是所有政治權力的來源，並合法控制國家的各型組織。[30]

表一：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統計表

黨代表大會	年 份	黨員人數
一大	1921	57
二大	1922	123
三大	1923	432
四大	1925	950
五大	1927	57,967
六大	1928	40,000*
七大	1945	1,211,128
八大	1956	10,734,384
九大	1969	20,000,000
十大	1973	28,000,000
十一大	1977	35,000,000
十二大	1982	39,650,000
十三大	1987	46,000,000
十四大	1992	51,000,000
十五大	1997	59,000,000
十六大	2002	66,940,000
十七大	2007	73,360,000

資料來源：James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Hilo: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2), p.94；〈中共第十七屆黨代表大會專欄〉，*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14/content_6173274.htm* 。
註：「六大」比「五大」的人數減少一萬七千多人，這是由民國十六年國民黨的「清黨」，以及其後中共內部的叛黨與叛變所造成。

自中共建政後，在黨的一元領導下，使司法、軍隊、警察都受其控制，它在中央有直屬機構，在各省市有黨委，黨的基層組織則滲透在企業、農

[28]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桂冠，1997 年)，頁 219。
[29] 李英明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巨流圖書，1992 年)，頁 27。
[30] Wang, *op cit.*, p.73.

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團體、軍事連隊等等。正如毛澤東所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方面，黨領導一切」。[31]不論就體制、制度或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大陸是施行「黨國一體」的共產政權，黨即國家甚至凌駕國家。中共黨組織好似無所不包的「連環套」，既貫串社會各階層，而各組織則藉功能互依（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整合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因而產生巨大的組織意識、自主性與國家能力。[32]在此，國家能力與中共的能力或統治力是高度合一的。

三、國家能力界定

王紹光指出，國家能力是指國家將自身意志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在中國大陸，這是指中央政府的能力而不是泛指政治權威，例如地方政府的干預若擴大，反而可能是中央的削弱。其次，當國家自主性越高則其動員、分配、使用資源以追求目標的能力越大。能力大的國家謂之「強政府」，能力小的國家謂之「弱政府」。[33]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perspective）與研究途徑，主要源於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國家是主要行為者且能規劃目標與主動追求利益及自身偏好與角色，也可將其政策偏好轉換成權威的公共政策並付諸實施，這是強勢國家觀點。國家相對於社會具有較大的能力與控制力，因而國家主導社會轉型。國家中心論者強調國家能力，亦即國家達成政策目標之能力以及國家自主性。[34]極權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皆強調國家能力，其觀察指標包括國家機關完成政策的可能，國家在面對團體反對或外在壓力時能透過政策操作與權力影響來完成既定目標等等。[35]其

---

[31] 吳安家，〈中共黨組織的變遷〉，收錄於華力進、雷飛龍編，《海峽兩岸四十年(上冊)》(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94 年)，頁 147。

[32] 楊汝舟，《中共群眾路線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76 年)，頁 134。

[33] 李少民，前引書，頁 96-98。

[34] 趙甦成，《從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之研究：以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為例》，中山大學博士論文 (2006 年 6 月)，頁 14-15。

[35] 龐建國，《國家理論發展》(台北：巨流，1993 年)，頁 233。

實，國家能力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或意識型態霸權，就是指國家對社會各階層的文化滲透，這是以教化形式而以學校、教會、大眾媒體為媒介，以表徵或型塑政權的合法性；二是國家的社會控制。文化霸權是國家對人民的內心征服，社會控制則是外在的行為約束，這以軍隊、警察、法院為主要工具；三是國家實施社會經濟政策的有效度。[36]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國家必須具備四種基本能力，這包括：（一）強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運用暴力手段、機構或威脅以維護統治地位的能力；（二）調控能力（steering capacity）：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隨時代進步，對現代國家越來越重要；（三）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 capacity）：運用政治符號（political symbol）鞏固統治地位的能力；（四）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動員社會經濟資源與汲取財政的能力。[37]

在政治學定義上，國家是人民的政治性團體與組織。然而政黨則是國家內部更具政治取向而結合的人民團體。就中國大陸的情形，中共已成為壟斷國家所有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源的龐大利益團體或命運共同體。基於黨國體制等特色，使中國大陸的「國家能力」更易藉由黨機器來強化「國家統治」與「共黨專政」等二而為一的偏好與目標，這是中共黨員或制度性組織武器所匯集的「加乘效果」。[38]基於國家行為偏好或組織理性，中共強化國家能力的目的都會指向「崩潰論」的避免與預防。以下，茲指出中共的五項能力建設。

參、中共國家能力建設

中國崩潰論預測失靈必定是有某些因素是該說所未顧及的。換個角

---

[36] 王紹光，《挑戰市場神話－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4-25。

[37]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5-6。

[38] Wang, *op cit.*, p.73

度，這應是中國大陸的國家能力或某些措施足以抗衡或抵銷其內外在壓力。就巴洛夫（Pavlov）定律，有刺激必有回應或抗衡。尤其 1978 年後，中國大陸的改革初衷也因「三信危機」或政經制度瀕臨破產等因素的刺激，使中共擬透過改革獲取「新能力」以維持執政地位。自鄧小平、江澤民以降，都在推出改革並強化國家能力以維共黨專政，胡錦濤也不例外，例如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宣示要「加強執政能力」。[39]胡錦濤強調，繼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著力建設高素質領導班子。於是，中共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等戰略構想。[40]當國家面對國內外壓力時，基於政權存續理性，總會用盡方法來極大化自身能力以抗衡壓力，包括制度化措施或其他。其實，中共也會利用外部能力建構而強化內部的控制力，例如 1996 年「上海五國合作會議」的遏抑「疆獨」設計，除對內採取鎮壓更與毗鄰的中亞臨國合作，希望從國外根絕分離勢力以及打擊恐怖活動。[41]以下，承上述國內外範疇作述。

一、國內部份

（一）黨的建設

歷來，中共領導人都重視黨的建設在救亡圖存或發展轉型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改革開放後為例，如表二）。李君如指出，[42]重視黨建設是中共組織的傳統。毛澤東把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武裝鬥爭稱為中國革命三大

---

[39] 徐斯儉，前引文，頁 143。

[40] 魏武等，〈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集體領導〉，*http://news.163.com/07/1021/07/3RAFATUM0001124J.html*。

[41] 張雅君，〈上海五國安全合作與中共的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46。

[42]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中共黨建布局獲 11 大新進展〉，*http://big5.ycwb.com/news/2007-07/10/content_1544232.htm*。

法寶。中共在改革開放後，依然稱黨的建設是法寶。總之，黨建設在增強黨的抵禦風險和拒腐防變能力，因「保黨、救黨」是蘇聯巨變以來，中共領導人的大問題。[43]中共必須有效回應環境變遷或挑戰，方能維持政權存續，例如中共意識型態雖是反資產階級起家，但組織部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黨員結構與黨體質因經濟建設需要而調整。尤其，中共「十六大」首次將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寫入黨章為其提供理論依據與合法化基礎。[44]然而，不論黨的改革、創新與調整都將帶來「黨國體質」的漸變或轉型。以中共的立場，這都為針對強化執政能力與權力鞏固。

表二：1980 年以來中共中央全會關於黨建問題的決議

時間	全會	決議
1980 年 2 月	十一屆五中	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1983 年 10 月	十二屆二中	關於整黨的決定
1990 年 3 月	十三屆六中	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1994 年 9 月	十四屆四中	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2001 年 9 月	十五屆六中	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2004 年 9 月	十六屆四中	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資料來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全會研究黨建問題一覽〉，*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6/2793954.html* 。

（二）經濟建設

經濟發展之國力增長（表三）是中國崛起的物質基礎與條件，也是國家「調控能力」與「汲取能力」的根本。「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間，中國綜合國力迅速提高，十六大時中國 GDP 是 9 兆，到 2006 年已將近 21 兆人民幣，增加一倍多。[45]中共應屬任務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故高度重視意識型態在國家能力建構過程的指引作用。

---

[43] 江振昌，〈大陸農村幹群關係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 (1992 年)，頁 62。

[44] 葉曉楠，〈中共黨員結構呈新特點更趨合理〉，*http://china.rednet.cn/c/2007/07/20/1263968.htm* 。

[45] 程俊雅，〈中國外交理論的新發展：關於和諧世界理論的分析〉，《棗莊學院學報》(山東)，第 25 卷，第 6 期 (2008 年)，頁 129。

表三：主要國家之國力比較

	中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俄羅斯
國內生產總額（2005 年）單位：10 億美元	2,234.3	4,534	2,794.9	12,416.5	763.7
國民平均生產毛額（2005 年）單位：10 美元	1,740	38,950	34,870	43,560	4,460
戰略核子彈頭數量（2005 年）	100	0	0	5,968	4,978
軍事支出（2006 年）單位：10 億美元	49.5	43.7	37	528.7	34.7
武器出口（2005 年）單位：100 萬美元	56.4	0	3,861	7,944	6,626
外匯存底單位：10 億美元	1034	864.7	48.76	69.19	314.5
聯合國預算（2006 年）單位：比例	2.053	19.468	8.662	22	1.1
國際貨幣基金投票權（2007 年）單位：比例	3.66	6.02	5.88	16.79	2.7
世界銀行投票權（2007 年）單位：比例	2.79	7.87	4.49	16.41	2.79

資料來源：盧政鋒，《中國崛起與布希政府的台海兩岸政策》，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 9 月，頁 51。

經建的高成長是需政策論述調整的有效性與適切性，關於經濟政策的體系化論述，例如 1984 年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1987 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1988 年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1992 年的「全方位開放戰略」、1992 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等。[46]又如 2003 年 10 月，中共召開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46] 雖然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冠上「社會主義」字樣，其本質卻是將舊有的經濟體系轉換為資本主義式或接近資本主義體系。請見：天兒慧，前引書，頁 7。

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份內容的建議」，內容都與促進經濟發展或維護社會穩定有關。至於其他的修憲內容，還包括「國家鼓勵、支援非公有經濟發展」、「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47]基本上，中國大陸的政策變遷是透過意識型態論述逐漸轉型與調整，其最終目的在適應外環境與提高國家能力。依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經濟建設是政治建設的基礎。尤其，新世紀的民生需求與經濟全球化，中共認知國家能力取得的主要來源在經濟基礎的穩固與擴張，且經濟性的國家能力有效性是政治權力支持與保障的前提。

（三）武力建設

這是國家「強制能力」的建設。國家屬性原就是擁有合法暴力的強制性政治團體，且共產的黨國體制更以武力為專政的安全支柱。當前，中國的三大武裝力量是：解放軍、武警及民兵，再加上黨政與公安等情治系統，共同形成國家安全的力量。[48]以下僅就中共的正規軍事力量作說明。

前蘇聯解體替中共的軍備擴充營造有利環境。1991 年開始，中共就積極爭取或企圖購買前蘇聯的現代化軍備與軍事科技人才。1993 年初，軍委主席江澤民指出，要建立一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的高素質軍隊」。其次，1991 年波斯灣戰爭後，中共已認知戰爭型態將走向高科技，因此強調「質量建軍」與「科技建軍」。[49]

在「質量建軍」方面，1990 年代末期，中共一方面持續加強解放軍裁減，將解放軍減至二百五十萬人，但同時卻強化特種部隊比例，如火砲、裝甲、工程、防化及陸軍輕航隊等兵種在陸軍的比例將超過七成，用以增強

---

[47] 寇健文，〈中國政治情勢：高層政局的演變〉，收錄於丁樹範編，《中國大趨勢：2003-2004》(台北：新新聞文化，2004 年)，頁 32-33。

[48] 施哲雄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3 年)，頁 275。

[49] 王宏平，《後冷戰時期中共國防改革之研究》，中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6 年 3 月，頁 32-33。

部隊機動力與戰鬥力。在「科技建軍」方面，[50]1990 年代以後，中共又開始恢復從國外引進武器、裝備和技術。中共在「2002 年國防白皮書」中強調，為實現國防現代化需不斷投入國防軍費（表四），並持續向先進國家採購高新武器。

表四：中國與主要國家的軍力比較

	中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俄羅斯
軍事支出 （2006 年） 單位：10 億美元	49.5	43.7	37	528.7	34.7
戰略核子彈頭數量 （2005 年）	100	0	0	5,968	4,978
武器出口 （2005 年） 單位：100 萬美元	56.4	0	3,861	7,944	6,626

資料來源：盧政鋒，《中國崛起與布希政府的台海兩岸政策》，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 9 月，頁 51。

（四）法制建設

這是「合法化能力」與「強制能力」的建設。此「法」者在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下，應包括國家法律或黨的規定與紀律。1997 年「十五大」，總共有 669,300 名黨員遭受黨紀處分；2002 年「十六大」增到 846,150 人。[51]2008 年，被開除黨籍、退黨的有 1,207,761 名。其中，黨政國家機關幹部 874,527 名，縣處級或以上幹部 90,322 名；被司法部門刑事追究或已作出判決的有 287,920 名，其中，黨政國家機關幹部 142,718 名，縣處級或以上幹部 51,933 名。被開除黨籍、責令退黨和受黨紀、政紀處分的人數佔黨員總數的 4.7%。[52]

---

[50] 2010 年 11 月，在珠海的航空展，中國展示 25 種以上不同的無人飛機(UAV)，這項科技被認為是軍用航空的未來所繫，顯示中國正投資可觀的時間與金錢發展軍事科技。請見：〈中國大秀無人飛機 國際側目〉，《自由時報》，2010 年 11 月 20 日，版 A29。

[51]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2007 年)，頁 143。

[52] 關捷，〈零八年中共開除 120 萬黨員〉，《爭鳴》(香港)，第 381 期 (2009 年 7 月)，頁 15。

針對上述的龐大數字，通常的解讀會傾向於中共的腐化嚴重，這往往也是「崩潰論」所強調的，但若對照「中國崛起」與「崩潰失準」的現實，本文則從另個角度得出不同推論：因中共決心「防腐拒變」則「〇八年中共開除一百二十萬黨員」彷彿是組織性的割除「腐肉」，而使中國的國家能力能去腐陳新與日趨茁壯。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產生本質性轉變也衝擊中共對社會的控制，「以法治國」的迫切遂受中共重視，例如（一）鄧小平曾說，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訓是深刻的……為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二）1996 年 2 月，江澤民指出，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部份，是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三）中共「八屆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九五計畫」和「2010 年遠景目標綱要」，又明確「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四）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大」報告對依法治國加強闡述：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 2010 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五）2002 年 11 月，「十六大」更誓言：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 2010 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53]於是，中國大陸的立法工作朝多元化與全方位發展，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的全國人大共制定 390 多件法律及相關規定，國務院制定 800 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制定 8000 多件地方法規。[54]

二、對外部份

國家必須創造新認同來提高國家「合法化」權力。[55]楊志恆指出，六十年來的中共外交，首先要內爭中國代表的合法性，以根絕國民政府的對

---

[53] 雷武君，《從馬克思社會衝突論論中國大陸地區法制變革之影響》，中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3 年 6 月，頁 51-53。

[5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府白皮書》(北京：新聞辦公室，2001 年)，頁 78。

[55]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 / Anti-Globaliza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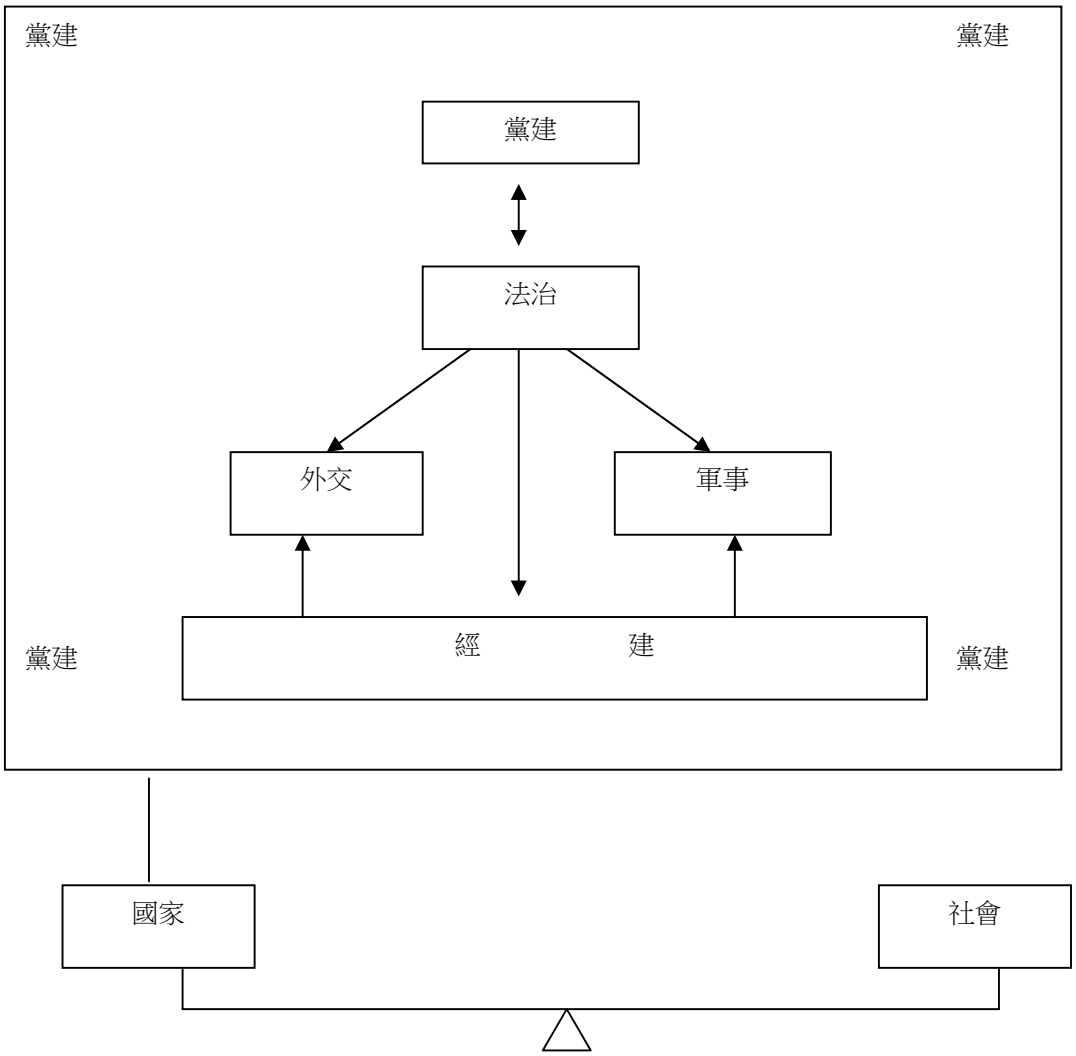
外關係；其次則要展現外交自主路線。[56]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巨變」的石破天驚變化，鄧小平等人曾採取措施以應付變局，這些措施與外交有關者為：（一）打破國家孤立，重建國際交往，拉攏第三世界；（二）否定戈巴契夫之作為。[57]就否定戈巴契夫作為而言，這是「蘇東波」變局對中共衝擊的「停損點」，接著必須重建國家能力以為「防變」積蓄能量，因此遂有「打破國家孤立，重建國際交往」之舉。中共建政之初往往被視為「虛弱的大國」。[58]但隨中國崛起，「大國」戰略意識其實肇始於 1992 年的「十四大」至 1997 年「十五大」後，則成為外交政策主流，其意義在於：（一）以大國來肯定與界定自己；（二）以大國角色與他國交往，爭取對方承認其大國地位。[59]本質上，大國概念與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崛起有關，[60]並代表國家能力的全方位提升。在「中國崛起」過程，澳洲大學教授 Stuart Harris 指出，中國大陸的決策者將逐漸將逐漸掌握國際制度的經營，學習如何「參與競賽」並瞭解中國大陸如何能因而獲利。中國大陸的領導精英已逐漸拋棄許多有關全球經濟秩序的老舊設想，並學習如何在其中運作，在安全事務也有類似情形，例如中國大陸參與多邊機制的意願越來越高。[61]

三、各能力變數關係模型

基本上，中共能力建立（capacity building）其目的在於政治穩定與免於體系崩潰。這兩者應有正向的函數關係，即 S = f（C）。C：能力；S：政治穩定。以下試將中共五項建設（黨建、經建、外交、軍事、法治）及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表述如圖一。

---

[56] 楊志恆，〈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10 期 (1999 年)，頁 29。
[57] 陳慶，前引文，頁 307。
[58] 張登及，〈中共外交中的大國概念〉，《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11 期 (2001 年)，頁 23。
[59] 董立文，〈論中共的大國意義及其問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6 卷，第 2 期 (1998 年)，頁 65-70。
[60] 張登及，前引文，頁 23。
[61] 田弘茂、朱雲漢 主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從十五大走向廿一世紀，頁 18。



圖一：中共能力建設關係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圖一中，黨建可謂是五項建設之背景與主軸；而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中，經濟是國家社會一切之基礎，故物質建設之基礎必為軍事、外交建設之支撐。另方面，「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領導人所重視並逐漸建立起來的「法治國」及其基礎不但用來肅清黨內貪腐，也成為其他建設奠立良好的運作環境，因此這五項建設的搭配可彼此強化效果共臻國家能力建

設。其次，若從「國家 / 社會」關係而言，不論自由民主國家或前蘇聯集團國家或中國大陸，這兩者間永遠處於「翹翹板」的微妙平衡狀態，只是民主國家是被治者同意，因此兩者關係會相對和諧；但共產國家的「專政」色彩必擁有相當的威權基礎（如本例中的中共五項建設）方能建立凌駕於市民社會的霸權。因此國家的能力建設與領導人決策品質應是決定及說明「中共圖存」與「蘇東劇變」的原因。其次，自由國家往往從市民社會強大等自身國家的現狀與角度去預測「中國崩潰論」而致失靈，因此本文擬從方法論與從實質關點（中共五項建設）提出修正觀點。

肆、中國崩潰論修正模型

關於「中國崩潰論批判」，本文擬提出兩種解釋模型，即論理解釋與模型解釋。基本上，論理解釋是認識方法論的問題。

一、論理解釋

中國崩潰論的預測失準或錯誤，應是認識上或判斷上的偏頗與「一面之詞」。這往往難以正確觀察與判斷客觀事務或外界現象，因而造成中國大陸研究的盲點。在論理解釋上，本文提出以下兩點作為中國大陸研究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礎：

（一）相對認識論

先賢「老子」指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後人註釋曰：「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者，皆相互為用，相輔相成。故有與無相待而生、難與易相待而成、長與短相待而顯、高與下相待而傾倚、音與聲相待而和諧、前與後相待而成序。[62]這種相對觀察與理解的認識觀點應也適於「中國崩潰

[62] 余培林注譯，《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4-6。

論」的觀察與判斷，即不只觀察單向度的力量，從應綜合觀察與其相抗衡的力量，且從動態而非靜態的觀察。

（二）辯證認識論

西方辯證法（dialectic）從希臘的辯證觀源起，後經德國的費希特（Johann Fichte）以「我」與「非我」作為正反互動的兩種形式。[63]辯證法字義有對話與爭論涵義，當雙方見解對立時，經由所支持命題的辯護與「對立命題」的攻擊而得到「綜合命題」，此綜合命題可包含「正命題」與「反命題」之所長，而揚棄「正命題」與「反命題」之所短。因此，可求得爭論概念更高層次的綜合與理解。[64]任何事象都處於變動，對任何現象都不能單方面去觀察而應全面或多方面觀察。[65]辯證法是思維邏輯，它認為任何事象或問題唯有從諸種不同角度方能把握真相，而「固執一端」只是孤立看法，那是不能看到全般情形的。[66]因此，單方面觀察到中國大陸政治系統的壓力面而遽謂「崩潰論」，應是預測失準之主因，也是研究對象的偏頗觀察。

二、模型解釋

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理論，不是社會科學而是金融與法律的。章氏觀察到某些政治力量而認為，這些將終結中共政權，包括反對性宗教團體、充滿怨怒的少數民族、內部不滿等等[67]。顯然這是「強社會、弱國家」等一般西方國家，市民社會揭竿而起推翻國家機器的推論與慣性思維，而非中國大陸「強國家、弱社會」等「後極權時代」特質。實務現象上，黎安友也指出，有關中國發展的預測除「中

---

63 吳康，《黑格爾哲學》(台北：商務書局，1970 年)，頁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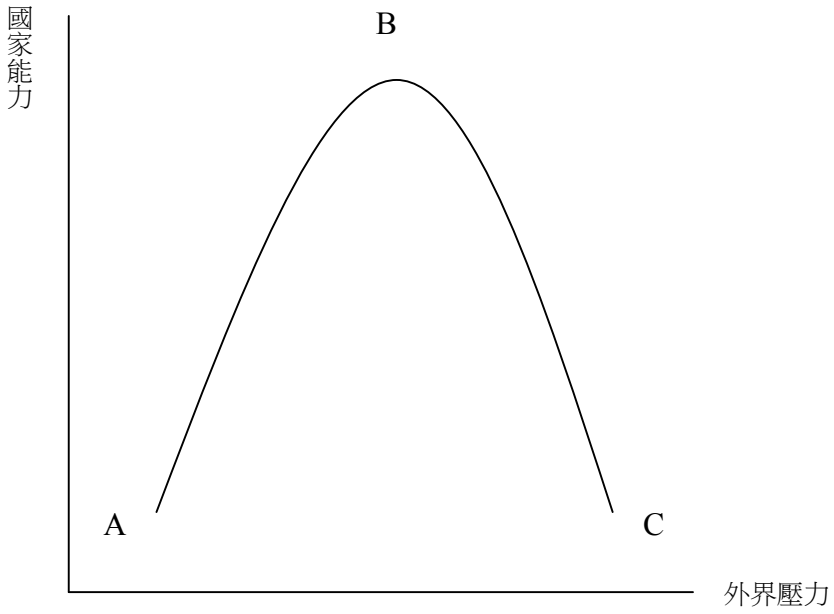
64 朱高正，《朱高正作品精選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170。

65 姜新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台北：黎明，1990 年)，頁 188。

66 初國華，〈唯物辯證法哲學要義〉，南亞技術學院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2007 年 5 月 6 日，頁 121-122。

67 黎安友(Andrew Nathan)，何大明譯，《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台北：巨流圖書，2007 年)，頁 2-3。

國崩潰論」就屬 Bruce Gilley 的「中國民主未來」。Bruce Gilley 認為，中國現存的威權政權已無法因應現代社會需求而不得不變革，但社會反對勢力弱小、分裂與離散而不足以推翻政權，即使中國大陸現有體制僵化但也有能力抗拒反對力量，這包括龐大軍力或武警以及一些政治技巧例如，如何應付遊行示威或安撫反對勢力等等。Bruce Gilley 推論，大陸已有龐大中產階級且領導層有強硬派、溫和派或改革派、保守派分野，足以啟動菁英協商而使大陸走上民主轉型。[68]依現代化理論觀點，經濟與社會發展將帶來政治開放與民主，大陸因經濟改革高成長將促成政治改革；相反的，政治穩定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卻認為，威權體制經濟高成長將鞏固威權而壓抑民主，在大陸則提供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與合理性。[69]綜上所述，本文擬提出相關國的詮釋模型（圖二、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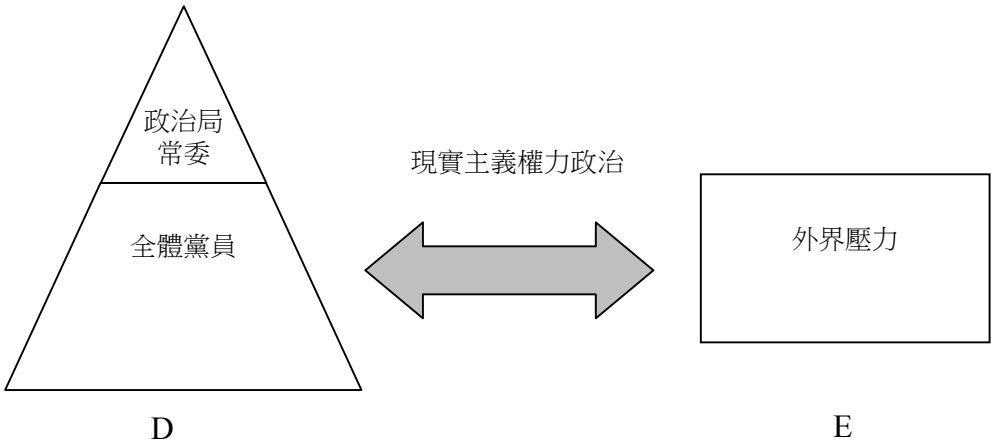


圖二：中國崩潰論詮釋模型

[68] 同前註，頁 3-4。

[69]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 vs.政治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 (1998 年 6 月)，頁 443。

若依「相對認識論」或「辯證認識論」觀點，中國崩潰論者是只見圖二中的 BC 線段，而忽略或低估國家理性對危機的反擊力道。其實，該圖是圖一的同質異形（isomorphism），當「翹翹板」向國家傾斜是本圖中的 AB 線段，當向社會傾銷則是 BC 線段。因此本圖之解釋力亦如圖一者。



圖三：中國大陸「國家 / 社會」抗衡模式

其次，依國際關係學理，欲衡量一個國家行為則意圖與能力這兩變數是關鍵的。在圖二的上升階段（A→B）代表國家能力大於（cover）外界壓力，則國家自無崩潰之理；在下降階段（B→C），雖國家能力弱於外界壓力，但也需外在反對力量有顛覆這政權的「意圖」方有可能使政權崩潰，例如文革雖使大陸的國家機關被「砸爛」，應屬體制內改革欲「打倒黨內走資派」，而無意圖要顛覆政權，故中共仍能渡過比「天安門事件」更嚴重與規模更大的危機而存留至今。至於圖三乃圖二的衍生，[70]中共黨組織藉由黨的建設、經濟建設、武力建設、法制建設、外交建設或其他「軟權力」與政治技巧，使其黨國力量足以拒斥國內外壓力而使體系存續。

[70] 圖 3 左邊之三角形 D 與圖右之矩形 E，其力量消長之階段有如圖 2 中之線段 AB 與 BC。

國家的鞏固是要聯結許多因素，包括統治精英企圖等等。[71]本文的預測論述以現實主義、菁英論與組織理論為基礎。依現實主義觀點，國家基於理性在追求權力過程是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72]且國家回應壓力的抗衡與對比過程是符應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色彩；而菁英論以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權力或權威仍由黨國一體的權力核心與政治菁英所壟斷，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仍掌握國家最高權力，任何中國大陸的預測或未來展望，黨先鋒隊屬性的頂層精英與為數眾多的普羅（popular）精英都是重要變數。再從組織論邏輯，中共七千萬黨員是一個共享國家政經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基於組織理性或個人理性，這龐大團體必竭盡所能（如中共五項建設或其他）維持一黨統治以及撲滅反對力量。基本上，遼闊領土與龐大人口的中國及其體制已超過古羅馬，西方學者吉朋在論述羅東帝國時指出，羅馬不知如何產生也不知如何滅亡。畢竟，人類理性或知識在推測大時代的過程總有其侷限性。然而中國未來的預測，是必須觀察正反雙方力量的對比，例如雖然民主或反體制聲勢很大，但國家能力成長仍無衰退跡象則政權應屬穩定；其次，中國大陸國家建設的五個指標（黨的建設、經濟建設、武力建設、法制建設、外交建設），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間的合作等等變化，都造成中國國家能力的消長。

伍、國家能力例證：政左經右路線分析

國家事務與政策路線繁多，本節僅以「政左經右」路線作說明。自由世界學界在預測與探討中國大陸改革的「政左經右」時，總認為這將使政治與經濟體制紊亂，從而帶來社會的相對剝削感、中產階級崛起、國營企業虧損、銀行壞帳、大量失業與官員尋租、工人失業等負面作用，進而導

---

[71] Held and McGrew, *op cit.*, p.26.

[72]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8), p.29.

致動亂與不穩。[73]這是從政策的體制面去論述中國崩潰或中共瓦解。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自由世界往往預測中共在「政左經右」體制結構的矛盾或緊張下，會逐漸解體。這種決定論（determinism）應只是改革開放的可能結果且是最極端的一種形式，然而也有其他可能，例如 Fan Gang 在一篇論文的標題指出，藉由改革步伐（速度）與範圍的控制，中國大陸成功的使開放政策的負面衝擊降至最小。[74]其實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政治系統遭受外界衝擊所帶來的影響，就有如「政左經右」帶給體制結構的緊張與刺激一般，同樣使原已處於某種均衡狀態的政治系統再次處於動態的不確定性。在此可以肯定，中共的黨國意圖與國家理性是要使這「不確定性」向上的良性提升，而崩潰論者則視為向下瓦解。然而透過國家能力的操作，卻有可能使「政左經右」的緊張或矛盾降至最低，甚至「化危機為轉機」，這應都是中共原先的計畫目標。畢竟當國家面臨危機時，其行為的「趨吉避凶」或「損失最小化」總是國家理性與行為的優先。基本上，共產體制轉型的「政左經右」也是史無前例的，鮮有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可資參考，否則中共在改革之初就會遠避此「崩潰魔咒」而非要走「摸著石子過河」。其次，就「化危機為轉機」而言，回顧中國大陸欲加入 WTO 之際也遭受內部的強烈反對，而認為中國大陸必無法承受 WTO 的開放衝擊，然而如今中國大陸被認為是成功的全球化國家而獲利甚豐，[75]這其中必定少不了國家能力的主觀能動性與選擇作用。Fan Gang 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在於政策的一致性。[76]

就中共黨史而言，由於中共的任務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屬性，使

---

[73]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ing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nry Rowen, "With Growth, China Could Get Democracy So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1, 1996;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Vol.38, No.3 (1986), pp.462-482.

[74] Fan Gang, "Globalization: Custom-Made in China," *Yale Global*, October 15, 2004.

[75] Ibid.

[76] Ibid.

改革議題一直是黨內的路線重心，甚至毛澤東指出中共黨內有「十次路線」之爭。表面看來，每次的路線之爭，外界總賦予權力鬥爭或權力傾軋的刻板印象。然而若從適應環境觀點，則路線之爭就修改或更換黨的政策與領導人，進而增強黨的生存能力或國家能力強化，例如「遵義會議」後的新局讓中共免於「第五次圍剿」的覆亡等是。同樣的，中共的國家能力取得總是藉由不斷的改革而增進。且就人類社會歷史演進過程，很多事是沒有先例的，甚至是「破例」後，以後才形成慣例，例如美國獨立戰爭的制憲會議之所以會採「總統制」是沒有先例的，甚至是為脫離舊大陸的「內閣制」之反動。因此世界對「政左經右」的批判是難有先見之明，只能依其內在的能力邏輯運作，而讓世界看到成功、失敗或混合現象的成果。畢竟這世界誠如黑格爾（Hegel）所言：理性必定存在，存在必定理性。

陸、國家能力回應與衝擊：中國民主化為例

由於中國大陸政治系統過於龐大、力量互動多變與「不可預測性」，然而就中共的「制度慣性」與領導人言論應可描繪出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建設的樣式或趨勢。基本上，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是否會動搖中共統治？[77]這往往引起政界或學界議論。它之所以採取民主改革主要是為回應外界壓力並鞏固自身政權。自胡錦濤接任以來，再度將「黨內民主」列為改革重點。「十六大」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並提出具體措施與制度建立，這包括：（一）擴大在市、縣進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二）完善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機制；（三）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四）建立和完善黨內的狀況通報等等。[78]推動黨內民主

---

[77] 石之瑜，〈大陸農村民主建設中黨的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 38 卷，第 8 期 (1995 年)，頁 36。

[78] 〈李君如透露中共黨建戰略佈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5/1/4/10035140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351406*。

是中共近年的主要改革方向，試以中共黨章窺知改革的部份內容（表五）。

表五：中共「十七大」黨章新增黨內民主的內容

總綱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 ……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第二章 黨的組織制度	第十條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是： （四）……，**黨的各級組織要按規定實行黨務公開**，…… 第十一條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 ，**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實行任期制。** 第十三條 **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
第三章 黨的中央組織	第廿一條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第四章 黨的地方組織	第廿七條 **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定期向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第五章 黨的基層組織	第廿九條 黨的基層組織……，**提出委員候選人要廣泛徵求黨員和群眾的意見**。 第三十條 **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的書記、副書記選舉產生後，應報上級黨組織批準。**

資料來源：張執中，《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2008 年)，頁 60。
註：框內的黑體粗字是新增內容。

1987 年，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到：以黨內民主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1990 年代後，隨中國經濟發展所衍生的社會發展失衡、黨幹部及官員貪腐，中共高層更重視黨內民主的落實以解決相關問題。[79]趙建民教授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深化與自我監督管理強化是這波中共黨內改革的重點，許多地方已展開民主新體驗，例如強調黨內分權、地方黨代會常任制、基層幹部直選等等。[80]中共在黨內民主下，推動差額選舉、權力制約、集體領導等等。當

[79] 呂靜宜，《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研究(1978-2007)》，中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 年 6 月，頁 78。

[80] 鄧若寧，〈2005 年中共改革 集體決策取代權力集中〉，*http://www.ettoday.com/2005/02/12/162 1748629.html* 。

有一定成效時，若人民要求深化政治改革則可用黨內民主的實驗作為「政改」的藍圖或依據。

從「十三大」到「十六大」，中共都強調黨內民主先行於社會民主或國家民主的順序或策略。大陸學者康曉光提出「中國特殊論」而謂西方的理論或經驗不能正確預測中國大陸未來。他認為，市場經濟、威權政治、新權威主義等意識型態的協同發展，將使中國大陸有效迴避「民主化危機」。[81]因此，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是從黨內再到社會。然而中共在黨內推動的民主與西式民主，例如三權分立或相互制衡並不相同。鄧小平曾多次反對西式民主，例如：（一）1986 年 12 月，鄧小平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82]（二）1987 年 4 月，他指出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這和資產階級民主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爭……我們實行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83]（三）1987 年 6 月，鄧小平再次批評「三權分立」而指出，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84]另外，2005 年 10 月，中共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表示：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走不通的道路。[85]因此展望未來，中共將以黨內民主的推動成果作為國家政治改革的試驗，以安撫人民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

中共領導人對民主可能抱持「實用主義」態度也不認為民主是可欲或

---

[81] 康曉光，〈中國特殊論：對中國大陸 25 年改革經驗的反思〉，《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 (2003 年)，頁 56-61。

[82] 鄧小平，〈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69113/69684/69696/494991.html* 。

[83] 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69113/69684/69696/index.html* 。

[84] 鄧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http://cpc.people.com.cn/BIG5/69112/69113/69684/69696/index.html* 。

[85]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 3645697.htm*。

可貴的價值，頂多視民主只是調和社會矛盾與促進未來發展的工具。[86]或許，中國大陸正在發展符合中國大陸國情的民主，並發展出結合傳統中國政治、一黨專政、基層民主選舉的民主形式。[87]關於民主改革，中國大陸目前可能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東亞模式」。[88]其實，中國大陸對民主改革是有疑慮的，就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道路」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排拒。這精神與立場與「四個堅持」之核心：堅持共產黨領導，其實是一致的。任何國家、社會或組織基於組織理性或國家理性，皆有維持存續與抗拒危機的動機與生命力。因此中共的能力建設除上述的五項建設，近來也積極圍堵或管理網路自由化對中共統治或政治穩定的危害。據說，中國大陸的「網路警察」已有千萬之眾，這應是中共國家能力不斷與日俱新與偕時強化的結果，因此不論是天安門事件的鎮壓或「茉莉花革命」的無疾而終，應可視為中共有效反應外環境的挑戰。

柒、結論

中國崩潰論失準是認識的偏頗與對中共實力認知不足所致。前者是方法論問題，後者則是實質問題。關於前者，本文提出「相對認識論」與「辯證認識論」；而後者，本文則提出中國大陸的「五大建設」。

就團體論（group theory）觀點，中共黨組織是龐大的政治性利益團體，其黨員是利害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可能是中共屢歷政治危機而安然渡過的主因。中共是否會垮台？黃仁宇以為，依中國的歷史經驗，只有當人民窮的無以為生，才較有可能發生大動亂。這說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成長應是政治穩定而未走向解體或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

---

[86] 丁樹範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2 年)，頁 12。

[8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6), p.206.

[88] 王方，前引書。

次，中共擁有七千萬黨員，雖在自由化高漲與意識型態退色的今天，它仍是龐大的權力共同體（community of power），若認為其統治已動搖或將隨「蘇聯解體」恐怕也過於樂觀。[89]雖然中共存在不少缺點，海外媒體也披露中共基層黨組織已癱瘓，或大陸人民對中共黨政官員腐敗、道德淪喪、官僚氣息、作風顢頇等等心存怨懟。[90]中共雖有組織惰性（inertia）或能趨疲（entropy）現象，但卻能從外界預測崩潰與覆亡陰影走出來（survival）與崛起，則它應有自身的「正面力量」或「支持因素」。這可能是外界一直「測不準」的原因。以中共的「整風」、「黨路線調整」甚至黨內鬥爭為例，外界往往直覺認為中共形將動盪或覆亡，但從中共立場，這也許是適應環境變遷或挑戰，並強化國家能力而必要的霹靂作法。

就台灣立場，兩岸關係建立與改善的前提在於彼此的深入瞭解與誤判的極小化。[91]中國崩潰論的預測失準，其實已對台灣早期的反共精神、反共國策、反共口號或反共意識型態等的目標落空產生異曲同工之效，這也暗示或啟發一個新時代背景，而開啟台灣對中國大陸新認識、新關係的契機，並在觀念上有所調整或在行動上能夠再出發。自 2008 年兩岸關係和緩以來，台灣距離「反共」的敵對意識應已遙遠，其實台灣大可學習美國的作法，利用中國大陸的成長並參與中國大陸的成長，此不僅著眼於雙贏且是壯大國家能力之機。其實當今的全球化發展，各國都需以其他國家的發展作為自身發展的前提，以便在國際規則的製訂過程，更多體現自身價值與維護利益。[92]

---

[89] 天兒慧，前引書，頁 9。

[90] 初國華，〈中共國家能力分析：從黨組織觀點的論述〉，《復興崗學報》，第 91 期 (2008 年 6 月)，頁 65-66。

[91] 中共總理溫家寶也說，不管是「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歸根結底都是對中國缺乏正確認識。請見：〈溫家寶面對中英公眾代表吐肺腑之言〉，*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ctv.com/china/20080118/106972.shtml* 。

[92] 唐仁俊，〈中國和諧世界理論之形成與其戰略意涵〉，收錄於《紀念辛亥革命九十九年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義守大學，2010 年)，頁 142。